

伯明翰学派的“霍尔范式”理论透视

□伏 珊 邹威华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 611130]

[摘要] 伯明翰学派因其独特的学术研究志向和学术价值追求正受到学界的强力关注。把握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线索,重点探究“霍尔范式”在伯明翰学派中的文化内涵和特质,剖析“霍尔范式”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和价值,将为我们全面反思该学派提供认知空间和视角。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 “霍尔范式”理论; 文化主义; 结构主义; 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3)03-0090-04

导 言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所承载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理论问题早就引起了人民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探讨。从范式的视角和认知去思考文化问题,大多局限于把文化所蕴含的内涵和价值归功于帝王将相,贵族,社会的精英,以及能主宰和掌控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那些族群等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他们所承载的价值被视为人民学习和效仿的经典。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在上个世纪被彻底打破和颠覆了,这种颠覆背后涌动着非常强大的理论思潮。而发轫于上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化研究被学界视为这种理论思潮的强力代表。其理论的坐标是1964年上半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由文学系的教授霍加特和来自牛津大学的青年才俊霍尔共同成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理论发展变流中的代表人物有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霍尔、约翰生、拉朗等学者。在他们周围汇聚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研修生,通过集体性的研究模式,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他们开放式的研讨风格,集结并完成了大量的著述和思想理论资源。这些硕果和研究的路数被后来的学者视为一门最重要的显学,被学界称为“伯明翰学派”。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很多学者更关注于该学派的局部理论问题和人物的代表性问题,往往

轻视或忽略对该学派理论发展的流变和发展轨迹的整体性思考和探究,也没有认识到这些流变和轨迹发展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论所承载的承前启后的文化特质,以及这些思想变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所以该学派的主题词“霍尔范式”理论就成为我们从宏观上考察,思考和研究该学派最重要的一种视角,为我们全局把握该学派的理论特质提供了重要的认知空间,并由此探究该理论主题词对当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霍尔范式”理论发轫的语境

伯明翰学派的萌芽和产生历经了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从起源中追溯和考察,英国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阿诺德、艾略特,以及利维斯等学者的思想被视为是英国学界“文化与文明”范式的标识,这些思想从根源上孕育了“伯明翰学派”的产生。这些思想被视为“伯明翰学派”产生的史前期,包含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1930),《伟大的范式》(1948),《小说与阅读公众》(1932),《文化与环境》(1933)以及《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1948)等著述。所有这些理论著述为伯明翰学派的萌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视为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的第一个阶段,这些理论资源本身也构成为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也

[收稿日期] 2013-04-01

[基金项目] 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批准号:09XWW001),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伯明翰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批准号:09XJC752001),201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马克思主义”》(项目编号:ZYGX2011J105),2012年度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培养资金项目等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伏珊(1984-)女,成都师范学院教师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教师;邹威华(1975-)男,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成都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是该学派所有学者共同关注和思考问题的起始点和发端,在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上为孵化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伯明翰学派”做好了前期的铺垫和准备。

正是在这种文化理论和思想的脉络中,出生于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源于对工人阶级、贫苦大众和社会底层的深切体悟,伯明翰学派最卓越的奠基人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以及来自牙买加的霍尔等人在他们大学时代就与成人教育,与工人阶级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在纷繁复杂的英国社会中看到了“大众文化”蕴藏的巨大能量,为工人阶级和“大众文化”呐喊助威,并在前后几年时间内书写了震惊英伦和世界的著述。具体上讲,这些著述包括霍加特的《识字用途》(1957),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和《漫长的革命》(1961),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霍尔的《通俗艺术》(1964)。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思想被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第三任主任约翰生(Richard Johnson)于1979年概括为“文化主义”范式,从本质上讲,就是文化研究的“文化与社会”范式。“文化主义”范式随着欧洲大陆的各种理论不断地涌向英伦半岛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文化主义”范式盛行的年代,霍尔不仅是见证者,更是亲身参与者,他的声音最有代表性,最有发言权,是最有说服力的学者。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整整待了15年。在这些岁月中,他使中心不断茁壮成长,从不知名的从属于英文系下的一个中心,变成一个学术研究的重镇。这其中霍尔的努力功不可没。霍尔于1979年完成他在中心的历史使命之后,1980年在英国的开放大学写下了最具影响的,最有深远意义的大作《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610-625},这是霍尔对伯明翰学派思想发展轨迹的一次严肃和认真的历史回顾、学术反思和思想批判。同时,这篇大作也被视为伯明翰学派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也被后来的学者惯常地称为“霍尔范式”,即:“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

二、“霍尔范式”理论特质

总体上观察,“霍尔范式”理论是霍尔深刻诠释和剖析生产于英国本土的“文化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以及源于欧洲大陆,特别是源于法国学者的“结构主义”范式和“反人文主义”范式的有机结

合体。这两种范式各有优势,各有不足,相互抵牾,在英国的思想和知识的版图中不断交锋。“霍尔范式”中的“文化主义”范式,尽管彼此呈现出分析和阐释的较大差异,但是从这些文化理论的见解中,还是可以总结和归纳出“文化主义”范式所指涉的主旨所在。这种范式集中聚集在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词:文化、经验、实践、生活方式、人道主义、情感结构等等。这些关键词着力把“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看成是生产和人的经验的整体生活方式,强调文化是源于人的经验和实践的各种活动,关切工人阶级最本色的“大众的”,“人民的”,“工人阶级的”经验和情感,以及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从本质上讲,如本内特所思考的那样,“文化主义思潮中的文化研究,就是去倾听“工人阶级真实的声音”^[2]。这种认识不仅感知到“大众文化”的存在,还深刻地认识到“大众文化”能动性的特质,这是“文化主义”范式带给英国思想界声音的呐喊,也是该范式真正区别于他们前辈最具特色的内涵之处。当然,在英国现实社会中,“文化主义”范式过分强调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作用,容易掉到“天真的人道主义”(naive humanism)的泥潭中。过分突显大众文化和人民的能动性力量和思想意识的自由空间,忽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那些被定位的,被动的,从属的地位和特征。

与此同时,霍尔也敏锐地认识到,“文化主义”范式在英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不断地暴露出其先天的不足和缺陷。这为“结构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时机和认知空间。确信的是,“结构主义”范式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了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长足发展。霍尔以及中心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在探寻理论出路的过程中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尝试,他们阅读韦伯,德国的唯心主义、本雅明、卢卡奇等等,一心想为中心的理论发展找寻合理的出路。当然,最终吸引他们的理论来源是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集中在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巴特,以及影响伯明翰学派最重要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等。霍尔曾指出,要理解“结构主义”范式,其理论前提是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那种机械的,僵化的,决定性的,化约论的思考和理解社会的模式首先要坚决予以批判和抛弃。而“结构主义”范式所要突显的是,大众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是人的实践的最终条件或决定要素,其实质是说,我们人类不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而是意识形

态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不是我们自身命运的主宰者和掌控者,而是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结构的各种形态。为伯明翰学派最为推崇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家是阿尔都塞,他理论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和“多元决定”,“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不是看成为一种虚假意识,看成为一种“表征系统”,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特征,为霍尔后来书写“文化表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土壤。同时,他把“多元决定”放在“差异”的认知层面,坚决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必然对应关系”和“必然非对应关系”。而是突出其“非必然的对应关系”,这种认识的转变是一种认知上的理论跨越,为后来的“后结构主义”的“差异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霍尔曾指出,“没有定律能保证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或清晰地赋予或对应于阶级所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立场。与本体论决裂的‘不作保证’的诉求就意味着没有必然的非对应关系(no necessary non-correspondence)。”^[3]这种认识为霍尔及其伯明翰学派的学者推进中心的理论,拓展中心的理论工作,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这是该学派能走向成功的标志之一,他们成功地摆脱了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的处境和尴尬,从英国以外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合理地吸收其理论资源,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建构注入了强力。

在“结构主义”范式中,意识形态、总体性、结构、决定性条件、抽象性等理论关键词都受到包括霍尔在内的伯明翰学派学者的强调,表现出了“结构主义”范式的活力和优势。具体来看,“意识形态”在结构主义的活力中占有决定的核心地位,“意识形态”完全解构了“文化主义”对“经验”和“实践”的认识,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结构主义的理解。“总体性”也是“结构主义”范式内核的要义,结构主义充分考察了有实践差异性和同质性的复杂统一体中的能动性,突显出“差异中的同一”,“同一中的差异”以及复杂的统一体。这些统一体为我们思考社会中各种关系蕴含的“意义”提供了总体性思考路径。“结构”是“结构主义”范式的本质性特征,指涉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关系和社会网络背后那种被隐藏起来的“结构”,这种结构是非二元的,是强调非人为的客观存在的实体,突显结构主义中物质和精神的有序排列,建构一种“非还原论”的价值取向。“决定性条件”是强调“结构”本身在结构主义构成中的重要性,

阐释在分析问题,不应该坚持命题双方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把“文化主义”范式中的能动性和经验等主题放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去关照和阐释。“抽象性”也是针对“文化主义”范式中的“具象”而言,强调认识世界和社会生活要从形而上的层面去思考,区分社会语境中各种不同意义的抽象性问题的指向和指涉。

尽管“霍尔范式”中的“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理论和价值取向,但是在伯明翰学派萌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各自对该学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构成为该学派最生动,最具活力的两大理论支柱,为后来的学者所称道。但是,就伯明翰学派理论思想的整个谱系学来看,“霍尔范式”中的“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了共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它们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具体性和效果,构成性前提的相似领域都超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指向的关系,无论是“文化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还是“结构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一致反对和坚决抵制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做机械和僵化的理解,反对经济和阶级的还原论和庸俗论的观点。但是毋庸置疑,霍尔范式中的这两种范式集中对立和交锋的主要表现涉及到“能动性和结构”,“经验和意识形态”,“实践和抽象理论”,“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差异中。

三、“霍尔范式”理论的反思

“霍尔范式”理论中的“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出现在英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是社会必然的产物。这种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建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分别代表了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伯明翰学派在其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和文学特质,这是该学派走向成功的标志和象征。

当然,我们应当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来思考,在当时的英国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中,随着欧洲大陆和美国各种理论资源源源不断地“引进”和“输入”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尤其以霍尔为代表的这一批有学术追求和学术使命的学者们怀有广阔视野,博大的胸怀,站在世界帝国的中心舞台,博采众长,一直在反思如何把更适合英国学术国情的“理论”用于对英国社会和文化,以及政治的研究。所以,就霍尔所书写的“霍尔范式”理论,阐释“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

和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用意是,一方面想着力反思他苦心经营15年的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和思想发展脉络,另一方面是想在这两种“范式”的基础上,超越这两种范式,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探寻出一条更适合英国国情的道路,并不断加强和促进该学派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

所以,在霍尔书写的“霍尔范式”理论中,他并不满意“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带给我们有限和局部的思考,他而是突出重围,尝试性地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出路提供了三种思考路径。具体来看,其一是围绕“话语”和“主体”推进,其问题是文化“主体”被概念化的方式具有跨历史的和“普遍性”的特征,它强调的是普遍性的主体,而不是历史决定性的社会主体,或者社会决定性的特定的语言;其二是又再次回到文化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中去,这是这两种范式都极力反对的模式;其三是与结构主义关系密切,从差异路径由此进入激进的异质性。这三种思考路径,霍尔并未对此做详尽的阐释和思考,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当然,霍尔思考问题和阐释这种范式也是有其用意的,他是想把这种范式看成为一种思考问题的平台,跨越这种范式,进入更重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理论体系中去。

与此同时,霍尔非常看中阿尔都塞理论中“多元决定”,并充分表明他对当代资本主义批评的深刻性,但是,遗憾的是,阿尔都塞过分强调了统治阶级的核心掌控作用,突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那种“妥协”、“斗争”、“谈判”与“协商”的博弈过程,这种发生在英国当代社会中的阶级之间的博弈对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深深地刻写在这些学者的内心深处。这种博弈和较量的力量正好与来自意大利文化理论大家葛兰西的理论思想非常契合。如霍尔所言,“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的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中范式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使其非常接近于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如果说有缺陷的话,那就是它们不断回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中,它们正确的坚持,对非还原性决定论问题的重新思考是问题的关键性所在:对此问题的解决将使文化研究的效能发生转向,以替代唯心主义与还原主义之间的无休止的摇摆。”^{[1]624-625}葛兰西的文化理论更突显阶级之间动态、妥协和博弈的关系,而非是一边倒,更突显“文化霸权”在实现统治

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就是后来学者所称为的“葛兰西转向”或“文化霸权转向”。

就“葛兰西转向”的实质而言,文化霸权是通过联合统治阶级的“强力”和“认同”在某些特定的遇合(conjunctures),特定阶级联盟的“总体社会权威”中去赢得整个社会形构和支配阶级:不仅表征在经济层面,还表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主要从领导权、市民社会、知识分子、道德以及物质层面。其霸权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地持续上演,被建构为一种矛盾的遇合状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正好解决了困扰着霍尔等伯明翰学派的学者所思考的理论出路问题,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站在一个更远的历史长河中来反思这种理论建构的话,那么葛兰西转向在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中的粉墨登场是其历史的必然。该学派学者所追求的学术使命是要把“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有机地融入到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去,解决最现实和最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问题,如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亚文化问题、女性的问题、种族的问题等等。这些社会生活中的实践问题为葛兰西转向在英国的发展提供了必然的社会和文化的土壤和根基。由此,从宏观上讲,综观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发展中的“霍尔范式”理论,“葛兰西转向”等等,它们不仅支撑着伯明翰学派理论体系建构的不断发展和拓展,是伯明翰学派谱系学上最重要的阶段;从微观上看,“霍尔范式”理论也是伯明翰学派理论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节点。这种理论节点不仅为我们全面思考该学派的理论发展脉络提供了认知路径,为我们认知霍尔理论思想内核的深刻性提供了思考视角,还为我们更有效地阐释“葛兰西转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研究“霍尔范式”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 [1] HALL S.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 in R. Davis, R. Schleafer, ed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Longman, 1994.
- [2] 托尼·本内特. 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M]// 陆扬, 王毅, 主编. 大众文化研究, 三联书店, 2001: 61.
- [3] HALL S.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J]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85, 2(2): 91.